

Shi

诗经研究丛刊

第十辑

中国诗经学会◎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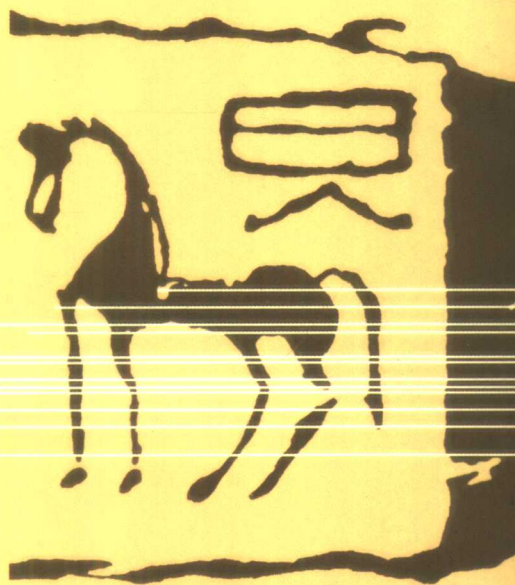
Jing

Yan

Jiu

Cong

Kan



诗经研究丛刊

(第十辑)

中国诗经学会 编

学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经研究丛刊(第九辑)/中国诗经学会编.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

ISBN 7-80060-331-8

I. 诗… II. 中… III. 诗经-研究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4632 号

出版发行:学苑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2号院1号楼 100079

网 址: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xueyuan@public.bta.net.cn

邮购电话:010-67601101

销售电话:010-67675512、67602949、67678944

印刷厂:北京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印张:850×1168 32开本 10.5印张

字 数:207千字

版 次:2006年1月北京第1版

印 次:2006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0001—1500册

定 价:30.00元

《诗经研究丛刊》编辑委员会

(以姓氏笔划为序)

主 编： 夏传才

编 委： 王长华 王洲明 向 熹

村山吉广(日本) 宋昌基(韩国)

陈新雄(中国台湾) 李家树(中国香港)

周颖南(新加坡) 林庆彰(中国台湾)

费振刚 赵沛霖 赵逵夫

聂石樵 顾易生 夏传才

董治安 褚斌杰

目 录

· 专题笔谈 · 漫话 21 世纪《诗经》研究

- 20 世纪《诗经》研究的几个问题 赵敏俐(1)
关于新世纪《诗经》研究的几点想法 王洲明(9)
谈谈《诗经》研究多维视角的拓展与交汇 廖 群(13)
《诗经》研究的过去、现在与将来 赵逵夫(28)

· 学术资料 ·

- 《诗经》发祥地初步考察报告 夏传才(53)
《四库全书》所收文学诗经学著作 ... [中国台湾]龚鹏程(79)
清代诗话论《诗经》资料辑录 [中国台湾]龚鹏程(93)

· 百家论坛 ·

- 论文化《诗经》与文学《诗经》的生成 杨子怡(188)
《大雅·板》新证 张建军(219)
《古诗十九首》引《诗》考论 黄震云 韩宏韬(229)
试论司马迁对《诗》的接受 王胜明(246)
姚际恒对《诗经》文学性的体认 罗建新(260)

· 学术札记 ·

试论洽川是“诗之源”	张步学(274)
“蓼”的解释和创新思维	胡远鹏(281)
《齐风·卢令》以炉观人	[美国]吴少达(286)
《陈风·宛丘》是祭天祈雨诗	樊树云(292)
《溱洧》的主旨与新解译	钱玉趾(298)

· 学术动态 ·

新书九种提要	(310)
论文六篇提要	(317)

· 专题笔谈 · 漫话 21 世纪《诗经》研究

20 世纪《诗经》研究的几个问题

赵敏俐

20 世纪的《诗经》研究曾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学人们也做过相关的学术总结,比如关于《诗经》的编辑问题,孔子是否删诗的问题,诗序的作者问题,风、雅、颂、赋、比、兴的问题,《诗经》作品的分类问题,等等。我觉得光有这些总结还不够,还需要我们从 20 世纪的学术理念、学术价值体系等方面对其进行另一种反思。下面我想从这方面谈几点自己的看法。

一、关于《诗经》的性质问题

《诗经》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这个问题在封建社会没有人提出疑义,它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经典,是“五经”之一。《荀子·儒效》说:“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可见,在战国时代,《诗》已经被认为是圣人的传道之书,已经有了“经”的意义。司马迁说:“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报任安书》)又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

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史记·孔子世家》)这话很能代表汉人的思想,在他们眼里,也认为这部书是圣贤所作,又是圣人孔子所编,所以它才具有如此崇高的意义。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经也者,恒久之治道,不刊之鸿教也。”可见,在中国古代人的眼中,《诗经》并不是一部单纯的文学作品,而是一部以“诗”的形式以表现圣人之“志”的“经典”。

古人关于《诗经》的这种看法到“五四”时代开始受到严厉的批判。1922年,钱玄同在给顾颉刚的一封信中说的一段话很有代表性:“《诗经》只是一部最古的总集,与《文选》、《花间集》、《太平乐府》等书性质全同,与什么‘圣经’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这书的编纂,和孔老头儿也全不相干,不过是他老人家曾经读过它罢了。”(《古史辨》第一册)于是,《诗经》不再具有了“经”的性质,而成了一部普通的中国古代诗歌总集。后人对此所作的评价是:正是“五四”的学人们才恢复了《诗经》的文学的本来面貌。这种认识奠定了20世纪研究《诗经》的基础,标志着诗经学的根本转向。

这里面显然有一个基本的问题需要我们重新思考。《诗经》在我们今天看来固然是普通的诗,但是当时人对它的看法也是这样吗?不是。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又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可见,孔子认为《诗》在当时是承担着多种功能,是有多种应用价值的。从现有

的先秦文献记载看的确如此。《诗》在当时所承担的第一功能是礼仪功能。《颂》诗主要用于宗庙祭祀的礼仪活动里,《雅》诗主要用于宫廷燕飨等礼仪活动中,《风》诗也用于各种世俗的礼仪活动中。诗在当时所承担的第二功能是政治教化功能。中国古代有采诗以观民风的说法,又有公卿士大夫陈诗献诗之说。无论是采诗还是陈诗献诗,诗在这里都被当成是为政治服务的东西,而不是用来审美。诗的第三大功能是作为贵族子弟的教学教本。《周礼·大司乐》说:“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於瞽宗。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武》。”这里所说的乐德、乐语和乐舞,都与《诗》有直接的关系。这说明《诗》里面包含着用于贵族教育的多方面内容。总之,正因为古人对于《诗》的理解与今天有着如此多的不同,所以我们就不能仅仅把它当作一部文学作品来看待,从这个意义上讲,说20 世纪的学者们恢复了《诗经》的文学的本来面目并不准确,这导致了《诗经》研究的狭隘化。今天,我们应该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重新思考《诗经》这部书的“文学”性质了。

二、关于《诗经·国风》的大部分是否民歌的问题

在20 世纪的《诗经》研究中,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关于《国风》是否民歌的问题。《诗经》本有《风》、《雅》、《颂》三大类别,

在这三类诗中,《国风》受到了当代人特别的关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 20 世纪的学者看来,《雅》、《颂》都属于统治阶级所作,而只有《国风》的大部分才是劳动人民的作品,属于民歌,是最有价值的部分。

《诗经·国风》的大部分真的都是民歌吗?早在上个世纪 30 年代,朱东润先生就发表了《国风出于民间论质疑》一文,到了 50 年代,胡念贻又发表了《论国风的大部分是否民歌的问题》。这两篇文章从周代社会的政治、文化、典章制度,《国风》本身的内容、词汇、名物,以及与后世民歌的比较等多个方面列举证据,说明《国风》不可能出自民间,它的大部分不可能是“民歌”。朱、胡两人的论证是有充分根据的,其观点是站得住的。但遗憾的是他们的观点没有被那个特殊时代的学术界所接受,至今,《国风》为民歌的说法还是主导性的观点而一直产生着影响。

我认为在历史已经进入 21 世纪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彻底纠正这种观点,这对深化当前的《诗经》研究极其重要。

在这里首先要为《国风》正名。说《国风》不是“民歌”,除了有朱东润、胡念贻等人提出的诸多证据之外,同样可以得到文字学和语义学上的证明。“风”是什么?风的本义是指风土、风情、风俗。“国”是什么?“国”指的是当时周代的一些诸侯国和地区。“国风”两字合在一起,从字面义上看已经非常清楚,就是指那些表现周代社会各诸侯国和地区的文化风俗、风土、风情的诗。同时我们还知道,在《诗经》中,《国风》是一个与《雅》和

《颂》相并立的概念,它的最初意义与音乐相关。简单地说,《颂》是宗庙之乐,《雅》是周王朝的朝廷之乐,《风》是各诸侯国与地方的世俗之乐。而我们现在所说的“民歌”,自“五四”以来已经有了特定的意义,即指下层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可见,无论是从诗的角度还是从乐的角度,《国风》都不是一个与“民歌”相等的概念。前者强调其地区性、民俗性和音乐性,而后者则特指其作者的阶级归属,二者不能混为一谈。

其次是我们设身处地地考虑周代社会的文化环境以及《诗经》的产生过程。虽然我国古代早就有“采诗以观民风”之说,但是我们不能把凡是从各地采来的诗都当成是“民歌”,即下层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国风》中有相当多的诗所写的都是贵族社会的世俗生活,真正可以认定是出自下层劳动者之手的微乎其微,而且这些诗篇也不一定是它的原始形态,同样是经过乐官们整理后的艺术品。在文化教育被贵族垄断的周代,下层劳动者还没有那样高的艺术水平,《左传》、《国语》等先秦典籍中所记载的一些民间谣谚可证。

其三是要纠正多少年来在《诗经》研究中形成的以作者的阶级性为标准的价值评判尺度。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是各民族各阶层共同创造的,其中那些优秀的作品更是整个民族生活的典型再现、民族精神的凝聚与升华,它们大多数都出自于各个时代先进的知识分子之手,即便是其源于民间,也往往经过无数代的选择与淘汰,最终又经过专业艺术家的加工,而不再是它的原生形态。因此,简单地把《国风》中的一些作品认定为民歌的根

据是不充分的,以作者的阶级性作为对《诗经》的价值评判尺度本身也是不科学的,由此而导致的在以往的《诗经》研究中重《国风》而轻《雅》、《颂》的倾向也是需要改正的。突破《国风》的大部分为民歌的说法,是深化 21 世纪《诗经》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三、关于《诗经》的文化价值重估问题

这一个问题与前两个问题紧密相关,同样值得我们重新思考。我们知道,在古代,《诗经》是被当作中国文化的经典来看待的,其地位是崇高的。这固然与后世儒家的推重有关,但是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它本身的价值,它起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诗经》不是一部普通的诗歌总集,而是中国上古文化的诗的表现与艺术的升华,是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具有奠基意义的文化典籍。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从传说中的远古走到周代,已经基本上发育成型,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性格,培养了独特的民族文化精神,比如爱国爱家的乡土情结、忧国忧民的思想意识、以孝为本的伦理观念、礼乐相配的文化制度、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等等,而这种独特的民族文化性格和民族精神,在《诗经》这部中国现存的第一部诗歌总集中就有了充分的表现。因而,这就使它成为了一部具有中华民族精神原藪和文化原型意义的著作,这是中国后代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不能与之相比的。

第二,《诗经》在周代社会并不仅仅是一部文学总集,而是周代历史、政治、宗教、哲学的艺术表现,是礼乐文化的一部分,是贵族子弟的教科书,是周人精心编撰的杰作。而周代社会的政治、哲学、文化、制度等等,又对秦汉以来的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影响,也是后世任何一部文学作品无法可比的。

进入 20 世纪以来,《诗经》不再有那种崇高的地位。究其原因,我以为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由于 20 世纪的学者仅仅把它当做一部普通的诗歌总集来认识,价值评估的角度发生了变化。在古代社会里,当人们把它当做文化经典来认识的时候,经学家们的重点是通过《诗经》的文本阐释来认识蕴含于这部伟大作品里的思想认识价值和丰富的内容;而 20 世纪的学人们把它当做一部普通的文学作品来研究,重点不过是认识其“文学”艺术上取得的成就。虽然也有些学者关心它里面所包含的文化内容和思想内容,但是其目的还是为了更好地说明它的“文学”特性,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评估角度,而这正是导致当代人对《诗经》认识偏低的根本原因。

第二,在 20 世纪的《诗经》研究中,由于受庸俗社会学的影响,把对《诗经》的文学研究又进一步狭隘化。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大多数学者都没有结合周代社会以至中国上古社会的特殊情况来对其丰富的内容进行客观的阐释,而是用极其简单的阶级分析方法来对待它,说《诗经》当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国

风》，是因为它的大部分是“民歌”，说《诗经》中最没有价值的是《颂》诗，因为那是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的庙堂之作。而《雅》诗是否有价值，则要看它是否对当时的周代社会进行了批判，是否反映了民生疾苦。把这样的价值评估标准用于《诗经》研究，不仅是对《诗经》在中国历史中的经典价值的一种彻底否定，也是对《诗经》“文学”价值的一种扭曲。新时期以来，对《诗经》的研究虽然逐渐走出这一误区，但是它的这种负面影响还严重存在，仍然需要我们对其进行认真的反思。

在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今天，我们要尊重传统、弘扬传统，就要溯源于中华民族文化的原始经典，就要对它进行新的价值评估，要重新确立《诗经》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同时也要重新思考我们的学术理念。

(赵敏俐，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关于新世纪《诗经》研究的几点想法

王洲明

20 世纪的《诗经》研究的确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多元的、全方位的、多种文化视角的、多层面的研究格局已经形成,也出现了一些学术精品并在某些研究领域有所突破。新世纪的《诗经》研究,也已经取得了成果,在此基础上如何再继续拓展,或者说,还有哪些重要课题值得深入研究,还有哪些重要工作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呢?下面就谈一谈几点粗浅的想法。

一、对《诗经》文本的继续研究和阐释,是摆在新世纪学人面前的重要研究课题。一个不争的事实是,20 世纪出版的各种《诗经》的注本、译本,对诗篇内容的理解,有很大的分歧,甚至同一篇诗而解释完全不同。我们完全有理由来“搪塞”,如“诗无达诂”、如仁智之见等。问题是,自西周初叶至春秋中期 500 余年现实生活记录的“诗三百”,真的就不能找到比较接近诗篇实际义的解释吗?我觉得,今天已经具备深入研究该课题的条件。历朝历代的有关《诗经》内容解释的资料固然可以提供借鉴,20 世纪一大批属于这个方面的研究著作,给我们提供了多方面思考的空间,而更重要的 20 世纪末期,伴随思想观念的转

变,大文化视角下的《诗经》研究,对周代社会(包括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地理、风俗等)与《诗经》内容上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诚然,我们还必须思考一些属于理论的问题,如,周代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具体说《诗经》所反映的是奴隶社会的生活还是封建社会的生活?在礼乐文化的总体影响下,特别是经过孔子整理的《诗经》,在表现和反映社会生活方面有哪些特点,又从而影响到《诗经》的内容?我想这些问题,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经过认真思考,总可以获得一个基本认同的意见。在对《诗经》内容进行研究和做出新的阐释时,可以采取分类逐一解决的方式,如,征引有关史料,确定有哪些诗篇的确是有关史实的反映;如有哪些诗篇现代人的解释基本没有分歧或分歧不大?如,集中对有争议的诗篇,在一定范围内展开研讨,以期得到较符合实际的认识。按照西方阐释学的理论,包括我们自己的鉴赏经验,阅读者在阅读的时候,的确有再创造的过程。但无论如何创造,文本是甲,阅读者不能说成是乙;文本是乙,阅读者也不能说成是甲。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诗经》研究界的同仁,有理由、有责任完成这一研究课题,给读者提供一个相对真实、相对平实的《诗经》读本。

二、对《诗经》进行综合性质的文艺学的研究。《诗经》的文学方面的研究的确也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如有不少《诗经》单篇的鉴赏文章,有《诗经》语言艺术方面的论著等。但我觉得,有些方面我们还做得不够,而有些方面我们还做得很少或基本没有涉及,更重要的是缺少综合性质的研究成果。如《诗经》艺术

的生成论,也即《诗经》的艺术形式为什么会是这样,而不是其他的什么样式,这应该从我们古老民族文化的多重方面加以探求。如《诗经》艺术中的创作论,就不止是语言的问题,应该包括有《诗经》创作中的取材、构思、形象、意境等方面的问题。《诗经》中的诗有意境,学术界的认识并不一致,在我看来,《诗经》已经开创了我国诗歌艺术中意境的创造,有不少诗是有意境的好诗。再比如,《诗经》艺术的形式论,就应该包括属于结构形式的章法,属于语言形式的句法、韵法,以及其他一些形式方面的特点和创造。可以把《诗经》作为我国源远流长诗歌创作的发端,《诗经》艺术对中国古代诗歌创作艺术而言,具有某种“范式”、某种“典型”的意义,因此,综合讨论《诗经》的艺术,就必须考虑到《诗经》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影响作用的问题。这种影响,有精神方面,也有具体形式方面的,特别是具体形式方面的影响,做起来可能会感到非常繁琐,没有下大功夫做过细的工作,就很难梳理清楚。以上仅就《诗经》进行综合性的文艺学研究提出一些粗浅的想法,这个课题肯定还会包括有更多的领域和更多的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三、在总结《诗经》的研究成果方面,我们已经启动两个大的项目:即《历代诗经研究长编》和《二十世纪诗义会通》。实事求是地说,这两个项目都有一定的难度,特别是前者。希望海内外的《诗经》研究者,关心和支持这两个项目,使其能得以顺利完成。除此之外,我还建议有兴趣、有能力、在高校工作、年轻一辈的《诗经》研究者,做一项属于普及、教育性质的研究课题,比